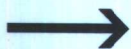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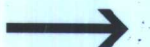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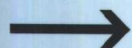
主编 陈昕



# 管理困境

——科层的  
政治经济学

当代经济学译库



[美] 盖瑞·J. 米勒 著

王勇 赵莹 高笑梅 季虹 译

韦森 总译校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主编 陈昕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管理困境 ——科层的政治经济学

[美] 盖瑞·J. 米勒 著

王 勇·赵 莹 高笑梅 季 虹 译

韦 森 总译校

当代  
经济学  
译库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美)米勒(Miller, G. J.)著;王勇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当代经济学译库/陈昕主编)

书名原文:Mangerial Dilemmas

ISBN 7-208-04311-6

I. 管... II. ①米...②王... III. 企业经济-经济理论 IV. 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6909 号

责任编辑 忻雁翔

装帧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

### 管理困境

——科层的政治经济学

[美]盖瑞·J. 米勒 著

王勇 赵莹 高笑梅 季虹 译

韦森 总译校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上海绍兴路5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www.ewen.cc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公司排版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2002年11月第1版

200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插页:5 字数:241,000

印数:1—5,100

ISBN 7-208-04311-6/F·923

定价:25.00 元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四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4)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

“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新知文丛”则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国际上当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之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译者的话

这是一本好书，一本有用的书。

这是一本由一位当代政治学家所撰写的“企业内部的经济分析”，是一本为学术界和管理者所撰写的非同于坊间“管理经济学”的“企业经济学”。

同时，这也是一部从“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ism)的视角探讨企业(科层)之存在理由、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及其困境的理论性著作，是一本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强的学术著作。可以说，理解了这本书，就大致掌握了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企业理论。更为可贵的是，从这本著作中，读者会进一步领悟“新制度经济学派”尤其是其中的“科斯定理”的理论局限。因为，在这部著作的分析中，作者深刻地指出，人们遇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时，会诉诸科层(即企业)，但科层本身也会失灵。人们遇到科

层失灵(hierarchy failure)时,是否会求诸市场?而如果“市场失灵”和“科层失灵”同时存在,人们又将如何做,求诸谁?于是,就有了所谓的“管理的两难困境”(managerial dilemmas)。

现在,书出得很多,但好书并不多,有用的书则更少。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国更是如此。现在,我之所以敢说这是一本好书,一本有用的书,是考虑到,它不仅是一本适应于广大企业管理者阅读的书,也是大学经济学专业和管理专业教和学“企业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的一本非常好的参考书。对于那些对目前在中国颇“走红”的“新制度经济学”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来说,读过此书后,可能也会觉得学到了很多,聪明了很多,知道了很多。

最早,我是从 Douglass North(1994 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之一,国内通译法为“诺思”)的一篇文章中得悉这本书的。当时,我在国外刚刚作完自己的博士论文,那大约是在 1995 年吧!也曾记得, North 教授曾在文中对这本书大加赞扬。

为什么时下如日中天的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级的经济学大师如此推崇这本书?当我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图书馆借出此书一读后,觉得果然不同凡响。读后确实觉得学到了很多,聪明了很多,知道了很多。于是,

我当时就决定，一定要组织人把这本书翻译到中国来。

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尤其是何元龙先生的鼎立支持，这本书的中译本终于能呈于我国的广大读者面前了。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就我个人的想法，这本书对我国广大公司管理者的理论素养和管理艺术的提高，以及对我国经济学界和大学里对“制度分析”感兴趣的学生们的未来理论探索，可能都将会有一些“边际”作用。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这本书，作为译者，这里谨对这本书中几个关键术语的译法作以下简单说明：

1. “hierarchy”。这是这本书的一个中心概念。我们根据国内目前的通用译法把它译为“科层”。了解 Ronald Coase（科斯）和 Oliver Williamson 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读者会知道，这是 Ronald Coase 尤其是 Oliver Williamson 所指的与“市场”（market）相对的一种资源配置形式。它大致相当于组织经济学中的“厂商”（firm —— 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在本译本中把“firm”翻译为“企业”）、“企业”（enterprises）和“组织”（organization）。在中文中，它更接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因此，本书的副标题也可以理解为“企业的政治经济学”。

2. “politics”和“political”。这是作者在本书中常使用的两个相关的“字眼”。我揣摩,尽管作者是一个政治学家(当然他也是一个经济学家,或正如他的“教授”职称所示的那样——一个非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政治经济学家”),但在这本书中,他既不是在我们中文的“政治”和“政治的”意义上来使用“politics”和“political”这两个概念,也不是在西方政治学的意义上来使用它们,而是在西方人日常用语的用法上来使用这两个概念的。一个人在讲英语的社会里生活一段时间后,就会知道,在西方普通人的眼中,“politics”是一个“dirty word”。因为照他们看来,“politicians”(政治家)都是些言不守信的人。因此,在现在西方人的日常用语中,“politics”的实际含义常常有中文中的“耍手腕”、“玩把戏”和“搞权术”之类的意思。同样,西方人常说的“That is diplomatic!”决非是说“那是(搞)外交”,而是在说“那是要手腕”。概言之,英文中的“politics”和“diplomacy”,在西方社会普通人的使用中,总是含有些许贬义。然而,Miller教授在这本书中却在中性——既“非政治”又“非贬义”——的含义上使用“politics”和“political”这两个概念,这就使我们在中文语言背景中很难用一个固定的词对译它们。基于这一考虑,在本书的许多地方

谈及科层内部的“politics”和“political”这两个概念时,我们根据上下文有时把它们译为“权略(的)”,有时则译为“行政(的)”。当然,在这个词被运用到指社会和政府职能的场合,我们仍然把它翻译为“政治(的)”。

3. “leadership”。这也是这本书中使用较多的一个概念。管理专业的人士能够直接体悟出这个英文词的含蕴。经反复考虑,我决定把它译为“领导能力”,而不是中文的“领导”。因为中文的“领导”一词反映不出英文的“ship”这一后缀的含义。相应地,在遇到本书中使用较多的“political leadership in hierarchy”时,我们不是把它译成“科层中的政治领导”而是把它译为“科层中的行政领导能力”。

4. “institutions”。除了导言外,这个词在本书中使用得并不算太多。在近些年的人文著中,我一再指出,把这个英文单词翻译为中文的“制度”是不恰当的。其主要理由是,由于英文的“institutions”本身主要含有“the established order by which anything is regulated”的意思,它既有现代汉语中的“制度”(rules and regulations——即规章、规则、章程和约束)的含义,也有中文中“秩序”(order——即一种事态[state of affairs])的含义。因此,经多年的反复忖度,笔者决定把两个中文词“制度”和“秩序”相加而删去中间的“度”和“秩”二字拼

合而成“制序”这个词,并以此来对译英文的“institutions”。但是,“制序”这个词的含义是否就等于中文的“制度”加“秩序”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或更精确地说,大致可以说是这样,但严格来说又不如此。因为,从上面所列举的这个英文单词的“the established order by which anything is regulated”的基本含义来看,我们是不可以把它视作为中文的“制度”(对应英文含义为“rules and regulations”)和“秩序”(对应英文含义为“orders”)的简单相加,而是**“由制度所调规着的建立起来的秩序”**这样一种含义。关于这个英文单词的中译法,详见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版)“序”、第一和第四章。然而,考虑到国内已习惯于把英文的“institutions”翻译为“制度”,我们在本译本中较多地把它译为“制序”(有时我们也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把它译为“机构”或“建制”),可能需要读者一个接受过程。另外,考虑到以 Ronald Coase、Douglass North、Oliver Williamson 和张五常(Steven N. S. Cheung)等为代表的 New Institutionalists 至今仍然忽略了对“institutions”中的“社会事态”(state of social affairs)即“秩序”(orders)层面或方维的研究,而只关注“institutions”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尤其是其中的产权

约束)即“制度”方维,我们还是照中国学界目前的通用译法把 New Institutionalism 译为“新制度学派”。因为,这种译法似乎是名副其实。

5. “constitutions”。作者在这本书中使用这个词也并不多。他在“导言”中对这个词的含义的界定是:“科层式企业中用以界定产权的制序规则与规范(institutional rules and norms)。”从这一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Miller 教授的使用中,只有这个词才真正与含有英文“constraints, rules and regulations”意思的中文的“制度”一词相对应(显然,在企业内部是没有英文的“宪政”、“宪章”意思的,而作者在使用它时,又显然不是指“构成”)。故我们在这本书中直接把它译为“制度”。另外要向读者说明的是,尽管我们注意到中国经济学界一般把英文的“system”翻译为“体制”,但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我们有时在这本译著中也把“system”翻译为“制度”。譬如,在本书中作者使用较多的“incentive systems”,我们均一律把它译为“激励制度”,而不是把它译为“激励体制”。

关于本书的作者,我了解得并不多,只是知道他目前是美国华盛顿大学 St. Louis 分校 John M. Olin 商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我最近发了封电子邮件给 Miller 教授,问他

是否愿意向中国读者说些什么,他只给我回了以下短短的两句话:

亲爱的韦森教授,对您致力于将《管理困境》翻译为中文,我非常感谢。中国有着高效管理的久远和辉煌(magnificent)历史,故能把这本书呈于中国学者和学生面前,备感荣幸! 忠诚的 Gary Miller。

最后,谨就本书的西人译名处理法作一点说明。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西人的人名翻译得很乱,乱得有些可笑,甚至乱得有些荒唐,这里仅举几例。在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青木昌彦、奥野正宽(Aoki & Okuno-Fujiwara)的《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译本第 315 页,曾出现了“威布伦”、“柯蒙兹”这样令人不知是谁的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的人名。由于这本书的译者并没有在中译名后用括号标明这些经济学家的英文名字,我们这里只能估计应是 Thorstein Veblen(国内翻译界一般通译为“凡勃伦”)和 John Commons(学界一般译为“康芒斯”)。在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理性的沉思:豪尔绍尼传》第 173 页,也出现了“坎特”提出了“无上命令”之说。由于译者没标明“坎特”的原文字样,我们只能从“无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推断,这里作者可能是指

德国古典大哲学家“Immanuel Kant”(国内学界一般翻译为“康德”)。另外,在海南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信任:社会美德与经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译者非常有心地在每个西方学者的中译名后标出了英文名,但作者在第23页把“Jeremy Bentham”译为“本泰”(国内学界一般把它译为“边沁”),在第21页把“James Buchanan”译为“巴切南”(国内学界一般把它译为“布坎南”),在第349页把“Joseph Needham”译为“尼达姆”(国内学界一般通译为“李约瑟”)。因为大家都是音译,这里谁又敢说上述诸书的译者译得不对呢?另外,国内学界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同一个法国著名社会学家Émile Durkheim,国内曾有涂尔干、迪尔凯姆、杜尔克姆、杜尔克海姆等多种译法。更为令人几乎不能容忍的是,同一个美国产权经济学大师Amen Alchian,竟被国内翻译界译成阿钦、阿尔钦、阿尔前、阿尔亮、阿尔恰、艾智仁、阿尔奇安、阿尔钱恩、艾尔齐安、阿尔切安等十多个中译名——甚至更多!在东方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哈耶克的名著《致命的自负》(中译本为《不幸的观念》)中,同一个John Mill,在前五章被译为“穆勒”,在后四章则被译为“米尔”。更有甚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Jean Tirole那本誉

满国际经济学界的《产业组织理论》的中译本中,竟出现了把作者本人的名字译成两个中译名“泰勒尔”和“蒂勒尔”的怪事(见该书中译本第20页)!

在国内学术界翻译外国著作之快,快得“连买都买不过来”,而各家对西人译名译得又是如此混乱的状况下,如何做?百般无奈,我们只能采取一种省事的办法:**对西人学者的名字一律采取不译而直标原国文字拼法**。但是,这种处理方法可能在开始会给已见惯西人思想家中文名字的读者带来一些不便。然而痛感于国内翻译界在西人名字翻译方面的这种几乎令人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除了这样做之外,我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处理方法。更何况随着现代电脑排版技术的普及,中西文文体的转换已变得非常容易了。因此,我考虑在新的现代电脑排版技术条件下,这种处理法不会给辛苦的编辑们和忙碌的打字排版员们带来多大困难。这是我决定在这本译著中采用西人学者名号直标原文这一处理法的另一考虑。至于这一做法是否恰当,也只有留给广大读者去评论和探讨了。

这本书翻译的分工是,王勇和赵莹翻译了“导言”和1—4章;高笑梅翻译了5—8章;季虹翻译了9—11章和“跋”。我则负责总译校。在译校过程中,我几乎对初译稿中的每

一句话都进行了再斟酌,并且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有所改动。然而,出于自己其他研究计划的压力,我必须在短短七八周的时间里将这本不大也不算小的著作匆匆总译校一遍。因之,里面的误译之处和纰漏恐怕在所难免。由于我负责总译校,这本译著中如有任何纰漏和误译之处,我则完全负责。如读者和翻译界的方家高人发现这本书中有任何错误,乞请惠予指正,以免继续贻误中文读者。是为序。

韦森 2002 年元宵节谨识于复旦



这一《制序与决策的政治经济学》剑桥丛书,将围绕着两个中心问题开展研究并试图作出回答:制序是如何在解决个人激励、策略及选择问题的过程中演进的?制序是怎样影响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绩效的?本丛书侧重于比较性与历史性的分析,而不是侧重于国际的或地区的研究如特指北美地区;着重点在于实证研究,而非规范分析。

在这一开创性的研究中, Gary Miller 致力于研究组织经济学文献中的一个根本两难困境。尽管对科层之所以存在的经济学解释是它能纠正市场失灵,但这种纠正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上级与下级之间激励不兼容的问题。管理者如何才能激发一个组织的成员们超越那种导致卸责的自利性行为呢? Miller 认为,那些管理者能够激发成员